

中法诗歌研究主持人语

车琳

诗歌是世界各国文学的源头，它被视作一国文学的精髓，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灵。长久以来，中国诗歌以其蕴含的东方哲学与艺术精神吸引了西方学者和作家，中法文学交流的三百年历史长河自然以诗歌为肇端。自 20 世纪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法国诗歌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法文学交流真正呈现双向汇通的趋势。在本辑中会集的一组文章或钩沉中国诗歌在法国的接受与流传，或探讨中国诗人和学者对法国诗歌的译介与阐释，反映出一种相互注视和理解的目光。

最早进入法国人视野的是中国诗歌是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最先把中国诗歌介绍到法国并产生影响的是 18 世纪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神父（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在启蒙世纪的法国，“中国热”勃发，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著名思想家和作家都曾经与遥远的中华文化相遇。安德烈·谢尼埃（André Chénier，1762-1794）是一位生活在 18 世纪末期的法国诗人，在其短暂的生命旅程和创作生涯中，他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相逢结缘于“中国热”的退潮期。法国当代比较文化和文学史家艾田蒲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欧洲》第二卷中曾经提及并评价这位锐意革新的法国诗人对中国诗歌的阅读，但是语焉不详，详细周密的论证有待深入。钱林森先生遍寻资料，悉心考证，以《法国诗人谢尼埃读〈诗经〉》一文填补了国内此项研究的空白。传教士编纂的中国述略为安德烈·谢尼埃打开认识中国文化的窗口，但是这位青年才俊却以批判精神对于传教士们在中国古籍中寻章摘句比附西方基督教义的做法不以为然。通过对谢尼埃所

读作品的详细考证和研读，钱先生强调了这位法国诗人在接受《诗经》过程中与前人的显著不同：他摒弃了传教士们“读经”、“释经”的功利主义，注重的是诗性解读，以敏锐的鉴赏力和审美力，深刻地领悟到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意隐喻，并从中撷取东方古国的文学素材，吸收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意蕴，以获得自身文化的诗性滋养，丰富其“仿古与创造、继承与革新”的辩证诗艺观。钱林森先生认为谢尼埃不仅是法国诗歌史上承上启下的作家，而且也是“法中文学关系史上继往开来的作家”。总之，诗人身份的安德烈·谢尼埃对《诗经》的审美阐释和接纳预示着中国古代诗歌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将在下一个世纪得到充分揭示。

如果谢尼埃没有英年早逝，他应该可以见证法国汉学史一个重要时刻：1814年，雷慕莎（(Jean-Pierre-Abel Rémusat, 1797-1875)）成为在法兰西公学开设汉学讲座第一人——今年恰逢法国现代汉学诞生200周年，这标志着传教士汉学向学院派汉学的转变。世俗化汉学的发展为法国文坛带来了东方灵感。雷慕莎所译李渔话本小说集《十二楼》之首篇《合影楼》激发了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泰奥菲·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在19世纪40年代创作了中国情调的短篇小说，从而开启了帕纳斯派的“中国风”时代。法国作家马克·夏都尔纳（Marc Chadourne, 1895-1975）1960年7月25日在国际法国研究协会第十二大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学史资料。在这篇报告里，我们可以了解帕纳斯派与中国文学的渊源，而且可以发现“中国风”吹拂到19世纪后半叶的整个法国文坛，从戈蒂耶及其女儿朱迪特到雨果、福楼拜、莫泊桑、马拉美，在各个文学流派都荡起了东方的涟漪。到这一时期，唐诗宋词的移译在法国诗人那里得到不仅是阅读和欣赏，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已经引发从帕纳斯诗派到象征派诗人的效慕，中国意象和韵律进入

到法国诗人的诗句中。马克·夏都尔纳先生在报告中没有满足于泛泛而谈，而是以生动有趣的口吻将当时的文坛轶事娓娓道来，并且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作品片段，为这一时期中国诗歌在法国的影响和接受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实证价值的史料。该篇论文的年轻译者叶莎在翻译法国诗人的中国风诗歌时，勇敢地采取了归化策略，以难得的才华将法文的音韵转译为汉语的格律，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尝试。

在 19 世纪下半叶，中国诗歌在法国的传播已经从汉学扩展到文学、从翻译发展到进入诗歌创作，打开了崭新的篇章。一个世纪后，20 世纪法国诗人克罗德·罗阿（Claude Roy，1915-1997）则将中国诗歌的翻译和自己的创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扬州大学法语教师许玉婷对克罗德·罗阿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以及翻译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罗阿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是一项具有研究价值的翻译实践：由于汉语水平有限，他难以独立完成翻译，因此借助中国朋友的帮助和汉学家的译本是必备条件；然而，他的译诗可谓依实出华，不拘泥于原文的字句与形式，却忠于原诗的意象与情神，同时具备法文诗歌的音韵，实现了堪称完美的再创造。许玉婷老师继而探讨了中国诗歌与罗阿的诗歌思想及创作之间的关系，指出他欣然接受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有意在创作中借鉴中国诗歌的广泛题材和简朴诗意的文风，拓宽了自己诗歌王国的领域，将古今中西融会贯通，“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值得研究的典型案例”。

中国诗歌在法国的传播呈广泛和深入趋势，已经脱离了纯粹的汉学范围。然而，只有汉学领域内的诗歌研究不断精深才能产生不断推广的原动力。出生于美国的德裔法籍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1926-）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致力于研究魏晋文学，从而填补了西方汉学界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介于

《诗经》和唐诗之间的空白。1980年，在前期著作《嵇康的生平和思想》的基础上，他发表了融翻译与研究于一体的学术成果——《嵇康的诗》。侯思孟依据个人之见将现存嵇康六十首诗篇根据主题分为赠兄诗、赠友诗、玄言诗和自传诗及杂诗，不仅翻译了其全部诗作，而且进行了主旨意义、情感抒发、结构层次、诗歌意象和音韵格律上的细致分析，从而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位身处乱世、心向旷逸的中国古代文人复杂而矛盾的精神世界。侯思孟高度评价了嵇康诗作的独特性：虽然他在诗体上并无创新，但是他笔下的山水、游仙、玄思都被烙上深刻的个人印记，因为之前描绘山水的诗歌范式都只用于礼颂或应景，神游仙山之乐的描写缺乏个性，而嵇康之诗直指内心深处，表现出自我灵魂的复杂多面，剖析自己在寻求精神救赎中的心迹。侯思孟在研究中不仅参考了嵇康文集的诸多版本和中国历代评家的见解，而且借鉴了日本和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融会贯通的视野和独抒己见的批评精神完成了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汉学研究。这一成果不仅全面而且深入，体现了一位西方汉学家的博学多识和真知灼见。

至21世纪初，法国当代汉学界出现了研究中国诗歌的新尝试，这一点体现在新近出版于法国的论文集《诗国漫步》中。该书是金丝燕教授领导的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汉学系与阿尔多瓦孔子学院密切合作的结晶。第一部分的论文以中国古典诗歌为研究方向，涉及屈原、汉代女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诗歌的音乐性。从内容可以看出，古诗仍然是法国汉学家们的钟情对象，但是当代的研究者注重从广度上开拓新的领域，或从深度上挖掘新的主题，或在角度上寻找新的发现。例如，汉学家们关于诗歌音乐性的研究更加专业，开始尝试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方法分析古代东方诗歌作品。从20世纪末开始，继承了中国

诗歌传统并接受了西方诗歌影响的中国现代诗歌终于以新生事物的身份进入了法国学界的视野。第二部分的论文便是以当代诗人于坚、北岛和程抱一的诗歌创作为研究对象。华裔学者是介绍和推广中国现当代诗人的主力，而中国文学的法国译者也是重要的研究者，他们以更加容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分析方法和批评话语，不遗余力地传播中国当代诗人的声音。总而言之，无论是探讨中国古典诗歌还是现代诗歌，《诗国漫步》中的十篇文章建立起跨越古今的精神对话。

相比于中国诗歌被介绍到西方，法国诗歌被引入中国是相对较晚的事情。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人几乎是在一个时期将西方诗歌发展史上各种流派兼容并蓄，直至同时代的诗歌。法国 20 世纪上半叶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便是在这样的交流语境下被译介到中国。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陈蕊的论文《瓦雷里〈海滨墓园〉在中国的译介与阐释》细致地勾勒了这位法国大诗人上个世纪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译介瓦雷里始于上世纪 30 年代，梁宗岱和盛成是在巴黎与法国诗人有过密切文学交往的两位中国作家，梁宗岱对《海滨墓园》的阐释和盛成对该诗的翻译、解读都显示出对瓦雷里诗歌精髓的把握。卞之琳虽然不曾与其晤面，但是中法两位诗人之间精神契合，卞之琳在诗歌翻译实践中继承了瓦雷里的诗学思想，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上世纪 90 年代，得益于北大教授葛雷先生的翻译，中国读者终于得见瓦雷里诗歌之全貌。陈蕊在梳理过程中融入了独到的分析，比较了三个译本、四种解读的异同，从而发现《海滨墓园》大半个世纪中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不仅体现了诗歌翻译中的主体性和归化过程，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交流传播中的本位观照和选择性接受原则。这是本辑中唯一一篇介绍法国诗歌

在中国影响与传播的论文，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在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际，追根溯源，在诗歌领域回顾具有悠久和丰富文化传统的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学交流，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上述各篇著作虽然各有角度，却充分展现了数个世纪以来中法两国诗歌交流汇通的精彩片段。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和而不同，中法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一定会继续推广和深入。